

语言与传播丛书

YUYAN YU CHUANBO CONGSHU



语言学家们的故事

徐红燕 / 主编

YUYANXUEJIA DE GUSHI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语言学家的故事

徐红燕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学家的故事/徐红燕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1

(语言与传播丛书)

ISBN 7 - 5017 - 6698 - 3

I. 语… II. 徐… III. 语言学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438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苏耀彬

电话 (传真): 010 - 6835 - 4197

个人主页: <http://fbshs.top263.net>

电子信箱: E-mail: cephs@economyph.com E-mail: suyaobin@126.com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白长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印张: 12.625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17 - 6698 - 3/G · 124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53507 68308640 68359420

68309176



徐红燕

作者简介

徐红燕，1979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师从于根元研究员。曾经在《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上发表新闻稿件十万余字，在《淘气包》《小画家》《小学生天地》等少儿期刊上发表了数十期连载小说和专栏作品。



探求语言学队伍建设的途径

——代前言

徐红燕

200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北京广播学院图书馆刚刚开门，冬日的阳光斜洒在北楼五层的书架上。我来到语言类书籍前，突然被一本书的名字拉住了脚步——《语言的故事》，书脊上第一主编的名字赫然印着“于根元”，此时我已经跟着于根元先生读了半年的硕士研究生了。这本书我听很多人提起过，今日才得以睹其庐山真面目。急忙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是1994年东方出版社出的，书不算厚，却很破旧了，应该是很多人读过的。随手翻了翻，里面都是很简短的小故事，作者都是语言学界的大家，如张朝炳、韩敬体、于根元、王希杰、陈章太、侯精一、徐枢等老师。文章讲的都是与语言文字有关的小故事，有关于语言的典故和趣闻，有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和分析，有关于语言教学和学习的看法。书中深入浅出的论述，不拘一格的文风，立刻吸引了我。我靠在窗边，晒着暖暖的太阳，一页页地翻了起来。

用小故事来阐释大学问，文笔活泼，深度却丝毫不亚于那些板着脸的长篇论文。这让我想起了年少时读过的一本小书，是夏丏尊和叶圣陶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写的，书名叫《文心》。也是用说故



事的方式来传授传统语文知识，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书中清新隽永的文字和丰富的知识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代人。

《语言的故事》一书的确能让人对语言产生兴趣和感情，我很庆幸自己找到了它。

没多久，于老师便告诉我计划出一本书，名字叫《语言学家的故事》。语言学家的故事？对，将语言学家钻研学问、为人处世、人生阅历、教书育人中的故事写出来，将这些语言学家们鲜为人知的一面告诉给读者，让更多的人了解语言学家们的治学之路和处世之法。这立刻让我想起了于老师十年前参加主编的《语言的故事》，同为故事，一个是讲语言本身的故事，一个是讲研究语言的学者们的故事。

2003年6月，我们正式开始向全国各地约稿。由于老师提名的各地负责人负责所在的省或直辖市的组稿和写稿任务，也可由这位负责人安排其他人员组稿和写稿。书的编写体例是：每篇文章讲述的是语言学家的故事，故事主人公为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副教授职称以上（含副教授）的学者（或相当于副教授职称，如副编审、副研究员），包括民族语言、计算语言学、外语教学和研究等领域的老师和学者，或者比较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稿件要求以一个具体故事为中心，不谈具体学术观点，便于读者对语言学家进一步了解，学习其为人和治学、生活态度和研究方法等等。若该学者的故事较多，可以写二至三篇。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该语言学家，一般在稿件的开头将该学者的生平或现在的情况进行介绍。每篇文章原则上不超过1000字。所写的事情必须准确真实。

于老师将主编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欣喜之余有些惶恐，发完约稿信就开始不安了：我所联系的各地负责人大都是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家，都是我的老师，他们的教学科研工作都很繁忙，我怎么催他们呢？没想到，发完约稿信后短短几天就收到了南昌大学中文系曹德和老师的回复，他说已经和江西语言学会会长刘焕辉先生商讨此



事，并且约定在适当的时候碰一下头，确定江西地区写哪些人，怎么写，谁来写。曹老师和刘老师对此事的重视顿时让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很快，我又收到了厦门大学中文系李国正老师的回信，并发来两篇稿子。从约稿日起，两个月内，李国正老师陆续发来9篇稿件，从电子邮箱发送的时间来看，很多都是深夜发送的。我给李老师回信说天热请他注意身体，李老师说：“我住在海边，夜深可闻涛声，时有凉风助读，真愿天涯共此时，搏浪学海中。”学者风范溢于信中。后来我才知道，李老师2003年8月底要赴韩国任客座教授，一年后才能回国，为了不耽误交稿，李老师赶在两个月内完成了稿件。原计划上海地区稿件数量为40篇，华东师范大学的蒋冰冰老师联系了上海各高校的老师、学生帮忙写稿，屡次修改，发来的稿件都整理得干干净净，还专门列了一个目录方便我查找。陈建民老师交来的稿子全部都是手写的，正规的稿纸上还是陈老师工整的笔迹，偶尔能看见陈老师认真修改的地方，每张稿纸都仍然非常干净明了。云南的李竹屏老师每次发来稿件都会给我打电话确认，记得有一次他是出差临行前给我发来的稿件，网络又出了问题，李老师只好委托他的儿子发给我好几遍，还不放心地给我打了电话解释。天津师大的郭红老师写完一篇稿子就发给我一篇，直到截稿前，她还在坚持采访语言学家，然后再把一篇篇稿子发过来，让我在好多个晚上读起来都充满了感激和感动。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每一位老师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整理和收集稿件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被感动着。为语言学家的故事，为写故事的人，为故事之后的故事……

感谢这些老师们，他们谦逊随和，认真负责，对书稿的支持和理解从信件的字里行间中都能体会得到，他们给了我约稿、催稿、改稿的信心和勇气。没有他们的辛苦付出，这本书的结集出版是不可能的。

我把这些故事告诉我的导师于根元先生，他说，不想当将军的



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是关键的时候不能当好一名士兵的将军也不是好将军。于老师写过一篇学术散文《领导师长》，他在年轻的时候领导过他的师长，他希望他的学生早点成长起来领导他。这也是很多语言学家的心愿，是对前辈们的继承发扬，是对后辈们的殷殷希望。中国的语言学的希望由此而见。

《语言学家的故事》共收纳了 175 篇稿件，涉及全国老、中、青三代语言学家。本书内容涉及语言学家的许多方面，把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启发性的事迹展现给读者。为了方便查阅，本书共分为治学篇、育人篇、处世篇、轶事篇、才艺篇和语智篇等六个部分。治学篇包括语言学家的求学、治学之路和各种研究心得、研究方法、研究中的值得思考的故事等；育人篇包括语言学家的教书育人的故事，多为学生写老师，肺腑之言，令人感动，也有老师写学生，师生之情，感同身受；处世篇包括语言学家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特点和风采，生活中的小故事，透露着大文章；轶事篇包括语言学家一些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不平凡的经历等，从另一个方面看出语言学家的性格和态度；才艺篇展现的是语言学家们的另一面，多才多艺的他们演绎着语言学之外的精彩人生；语智篇则是语言学家展现语言智慧的故事，研究语言的人，语言一定丰富多彩，充满智慧和玄机。有些故事涉及几个方面，分类不是很严格。

二

长期以来，中国的语言研究是为注释经典和语文教育服务的，属于语文学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中国语言学开始从语文学中独立出来，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篇章。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是无数语言学家的辛苦劳动的历史。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章太炎的“语言文字之学”、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大众语的提倡者、国语运动的推广者们、早期语文教育的研究者们、毛泽东、胡乔木、吕叔湘、朱德熙……



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语言学在各个领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学术队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和队伍建设是密不可分的，研究要有后劲，队伍建设必须跟上，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研究方法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策划编写《语言学家的故事》一书，想将当代语言学家的风范尽可能多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现语言学队伍的面貌，来探讨语言学队伍建设的某些途径。

队伍建设首先包括老中青语言学梯队的搭建，包括领导层的建设、导师层的建设和研究生的建设。

领导层要起统领作用。领导人才要能纵览全局，在历时共时交叉的背景下对我国的语言学提出深刻的中肯的适度超前的意见。领导人才也需要主持并且实际参加课题研究，而且做得更好一些，从中进一步取得领导经验。在这一点上，很多语言学家值得称颂。一个意外的事情，让陈建民先生萌发搞口语研究的念头，吕叔湘先生听完陈先生的汇报后，马上批条子将当时罕见的一台录音机提供给陈先生搞研究，并鼓励陈先生大胆研究，对陈先生搜集到的语料提出了意见，如多搜集老百姓的语言，不要搜集口号语言等。陈先生后来在口语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语言学界也流传着一台录音机和吕先生的教诲成就了一个研究领域的佳话。1994年，何耿丰担任了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当时省语言学会领导班子已有老化迹象，为了培养语言事业的得力接班人，何耿丰把目光投向了福建师范大学青年学者马重奇。何耿丰从语言工作的全局着眼，摒弃门户之见，全力支持马重奇。他的这一举措得到全省绝大多数语言工作者的拥护，使换届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马重奇担任会长之后，何耿丰在关键时刻总是予以支持。在马重奇担任会长期间，全省语言工作出现了建国以来少见的新局面，取得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学界同行称赞福建省语言研究成果丰硕，马重奇说，这 and 何耿丰教



授与全省同仁的支持分不开。

导师层的建设是中流砥柱。出成果出人才，主要是这个环节。要以研究带工作，要解决实际问题，又要发展学术。很多导师以身作则，克服各种困难搞科研出了不少成果。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树先教授开始是学习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偶然读到陈士林先生的文章《骆虞注释中反映出来的几个训诂问题》（《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黄树先惊奇地发现训诂难题原来可以拿汉藏比较语言学来解决。从此，黄树先立下志愿，希望把中国传统语言学和汉藏比较语言学完美地结合起来。那时民族语文的材料不多，做汉藏比较的相关文献也不容易得到，同时复印条件有限，价格也不菲。为了收集材料，他就自己动手抄录原文，编写索引。他曾抄过王辅世先生的《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的长篇论文，190余页。还抄过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及《韵镜》。在上海学习期间，他手抄了郑张尚芳先生的《汉语上古音表解》。导师层的科研任务本身还包括了队伍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带出一支优秀的研究生队伍。陕西师范大学刘静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和汉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在音韵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刘静教授认为只有把历史研究和实际调查结合起来，才可以找到更新的、更好的线索，才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她带领三个研究生一起去兰考记音，在记音方面的细致和执着，让随行的学生体会颇深。

研究生的队伍建设包括选优和培优两部分。首先是选优，要选择视野开阔又脚踏实地的年轻人，有独立完成任务能力却又能团结作战的人。发展这样的一支队伍，有时候比出学术成果更重要，这是很多无私的老师们的的心得。他们求贤若渴，对学生因材施教，注重方法，严格要求。南昌大学的陈昌仪老师经常对学生说读书千万不要使自己成为“书袋”，学了知识要善于运用，要深入到下面去进行大量的调查，写论文要做到“三新”：“材料新、观点新、角度新”；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俐李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她要求学生每



周交一篇读书报告，每学期写一篇读书综述。很多老师尤其重视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对学生的教导，陈建民先生回忆了吕叔湘先生是怎么教他读书的：“如何才能把书读进去呢？吕先生特别强调，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读到一半之后就应停下来，然后把本子合上想一想，要是我来写，接下去我该怎样写呢？想好了再把本子打开继续读下去。读完后再进行比较，想想谁的思路清楚，谁的推理合乎逻辑，谁使用的材料更说明问题。这样，对书或文章的内容就会加深理解，增强鉴赏能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山东大学的路广正教授曾对学生说：“我是受前辈学者的影响，继承了前辈学者朴学的作风，教学生以及自己做学问都要做到言必有据。”他给学生讲了冯沅君教授为纠正方音，逐字查阅字典的故事，令学生深受感动。

队伍建设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文风和学风建设问题。一个好的队伍，学风和文风一定要好。蒲松龄在《聊斋》里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盲和尚能以鼻识文，好文章焚之其香如兰，闻之入心入脾，回味无穷。坏文章焚之其臭无比，闻之格格不入，令人作呕。这大概是对文风最生动的注解，也是对旧时代八股取士制度辛辣的讽刺。一般而言，好的学风必须以好的文风作为它的表现形式。树立好的文风，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哗众取宠、弄虚作假之心。现在急功近利的情况比较严重，要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急于求成，要耐得住寂寞。天津语言学会副会长高歌东老师研究语言是从研究歇后语开始的，他做调查研究从不放过一丝机会，有一次他到外地图书馆查阅资料，当时图书馆正在清理，不对外开放，他就在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里抄写，中午下班时他就要求管理人员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继续抄写。他啃着干面包，喝着办公桌上剩的凉白开，心里却很满足。

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进行语言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研究出的规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能够对实际生活和社会进步有帮助。既然是



对社会有帮助，就应该是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言之有物就必须善于观察和勤于思考。不观察、不思考就会人云亦云，没有真知灼见；不观察、不思考，就会老生常谈，提不出新思路、新见解。真正新鲜生动、富于创造性的见解，是与深入的思考、对实际生活的独到体验和认识分不开的。良好的学术风气是鼓励创新的。厦门大学的林玉山教授研究学问成功的地方有两条，一是不唯书，不唯上，很有闯劲，但又不自以为是。当年三十多岁的他，年轻人一个，而王力先生是国内外语言大师，他也敢对王力先生的著作的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又怕自己的看法不妥，将稿件寄给王力先生本人请教。而王力先生给予极大肯定。李尔纲对林玉山主编的《辞书学概论》有不同的看法，林玉山不但不耿耿于怀，还与李尔纲交往很深，但在报刊上却进行论辩。他对李尔纲说：“观点不同，论辩，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形象、有力的论述，同样来自对事物的深刻分析和细心体察。这一点更体现出了融于生活的重要性。同时还要博览群书，打牢根底。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德春教授对日常生活遇到的新的语言现象十分留心，在积累中思索，产生看法。十多年前，他到新加坡讲学。一次休息时，当地一学者问起一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蜡烛”的涵义。王先生就举出了蜡烛的很多涵义，有代结婚，有指暮年，还有说思念的凄凉，教师的奉献的……后来，他发现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词除了有概念意义外，还具有深刻的文化涵义。再后来通过自己的研究，形成了较系统的想法，就开始发表论文，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王先生的很多研究都是这样做的。武汉大学的萧国政教授经常给硕士生和博士生说：“一个人要想做好一门学问、干好一件工作、成就一番事业，应该做到‘三实四心’，就是：学风要踏实、学问要扎实、文风要平实；并且要有雄心、有耐心、有恒心，并处处留心。”他自己也就是这么一个具有“三实四心”的人，他不人云亦云，并长于在一般人觉得没有什么的地方发现问题，揭示规律，写



成文章，给人启迪。

要避免套话、虚话、官话连篇等不正的文风，就必须注意吸取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营养，开阔视野，拓宽知识面，并且注意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要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华中师范大学的邢福义教授年轻时发表了一篇文章，33年后，他已经59岁了，还发表文章反思说，那篇文章存在问题，一是肤浅，二是拉起大旗作虎皮，文章在标题里就摆出了一顶“形式主义”的帽子，末尾又用了一些“革命性”很强、“火药味”很浓的语句。他反思说：“如果说，文章写得肤浅是由于学力不足，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可以原谅，那么，拉起大旗作虎皮便是一种很坏的文品，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任何时候也不可以原谅的。”“现在，我已为人之师，在学风和由学风引起的文品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有必要借对这篇小文章的反思小结，表明有所检讨，并且表示决心和我的学生一起永远引以为戒。”文章的末尾说：“本文的内容，我和我的研究生经常谈到。用武汉话来说，这是‘掉底子’。我愿意跟青年学友们一道，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求进取，求超越。”我的导师于根元教授经常对我们说：“我们要善于从语文评议失误中总结规律。这不是嘲笑谁，而是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我们自己也有过不少评议失误和别的认识错误，这是允许的，但是对于自己公开发表过的不对的学术意见，认识到之后，原则上要公开作自我批评。这是学风问题。”

队伍建设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独立与团结相结合，就是说既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又具有团队合作精神。有些工作是需要独立完成的，要敢于接任务，合理安排时间，高效率完成。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担任国内外众多学术委员会职务，发表法语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150余篇，著作6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主编过很多大型丛书或文集，很多学生都问他，人的一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精力和才智，去完成这么多的事情。许教授回答



说，人真的很渺小，不管你是谁，多么有才华，能干的事情非常有限。如果浮躁一点，就一事无成。对高效率地完成任务，很多语言学家有独到的见解，已故语言学家金有景先生在方言、民族语言等方面著作颇丰，他的观点是“两短一长”：定题目时间短，收集材料、观察研究到形成观点时间长，观点成熟后写成文章时间短。金有景认为要多出成果，就应该不断有新题目装进脑子里，脑子里同时考虑许多问题，哪个考虑成熟了，就写出来，这样就会有写不完的文章。他把这种方法称作“腌鸭蛋”，就好像不断往坛子里添鸭蛋，结果不断有腌成的鸭蛋出坛子，咸鸭蛋总也吃不完。

我的导师于根元先生提倡“滚雪球”，不断地积累，越滚越大，动态地发展，上手快而且后劲足。他认为，年轻的学者不能只是完成某个课题，还要会系统地领导较大的课题，主持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和时间比较长的课题，一是要宏观把握这个课题的价值和我们做这个课题的优势。二是要有一支比较好的队伍和比较好的分工。三是要出优秀的成果和出优秀的人才相结合。四是出集体成果和个人成果相结合。五是能持续发展。六是自己带头做课题。七是要能根据情况随时应变。八是要有经济头脑。还要经得住社会上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于根元，《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有些工作是团队合作完成的，个人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要听从安排和指挥，时间意识要强，不能影响后面的人的工作，我们要讲究信誉。于老师前段时间出了好几本书，商务的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学术散文集，方法和方法论的书，论文集，于老师还写了几篇新的论文，手上还有几个大的研究课题，还要指导我们的论文，敦促师姐们的新著，还有学校的教学任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课都不少。想想这些，我都觉得汗颜，老师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么多事情，他的眼睛还不太好，前段时间身体还不太舒服。于老师却永远是那么从容，哪个出版社催稿，哪个刊物约稿了，他从来没有着急过，俯拾皆是，成竹在胸。



于老师的勤奋和高效率向来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他担心的却是交给我们的任务，对年轻的我们，他总是时常告诫我们，珍惜机会，一定不能言而无信。我记得刚发约稿信不久，就收到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高万云老师的回信，他说：“于老师也是我的师长，同时还是我的朋友。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三个人给我的帮助最大，那就是胡裕树先生、宗廷虎先生和于老师。所以凡是于老师嘱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倾全力完成。”于老师的朋友很多，他为人宽厚待人真诚，这一点是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此外，于老师经常对我们学生讲，要自信还要他信，让别人信任你，你必须言而有信。要自助也要他助，自助才可能得到他助。看到高万云老师的回信，我对于老师的话有了更深的体会。各位老师非常支持此书的编辑工作，对我也十分爱护和照顾，这和于老师多年来的治学处世是分不开的。

队伍建设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要科学工作者的品格和事业家的眼光。科学工作者的品格就是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语言学是科学，语言学者是科学工作者。作为科学工作者，要熟悉和尊重反映本质的事实。尊重不同意见，尊重和自己原有意见不尽相同的事实。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闭门造车，不要自圆其说，不要一成不变，而要与时俱进，随时超越自己，迎接不断发展的现实。近百年来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语言观接受实践的检验作出补充和修正是很自然的事情。补充和修正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探索。科学的语言观是建设语言学这一大厦的总体设计思想。语言学者应该随时调整自己的语言观，根据实际情况检验自己的语言观，多向生活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上海理工大学的何刚教授读遍了能够找到的语言理论典籍，却发现真正吸引他注意的还是生活，因为正是生活呈现了生动活泼的语言全貌，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复旦大学的胡奇光教授从一些非常朴实的问题入手去研究问题，比如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胡先生就注意对作家的语言进行特别的研究，即从语言研究



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并发现了作家语言同其他语言研究的许多不同之处：作家语言不仅是流动的、有意味的，而且提供了多重信息，是对平凡生活的凝结。胡先生就是这样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学习经验，善于发现一些最朴素的问题并切实加以研究，这也正是科学研究的态度。陈建民先生研究口语，为了搜集真正的口语资料，他下工厂，到农村，串街道，访亲友，找线索，跑了北京许多地方，辛辛苦苦地录下了50多篇口语录音材料。李宇明先生为了研究儿童语言，从他女儿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记女儿的语言日记。女儿满月的时候，他要离开河南信阳的小家到武汉执教，就揣着从口中省下的几文钱买了一台价钱最低、吡啦作响的录音机，把记录任务托付给了病弱的妻子白丰兰和一直帮他理家的侄女王小兰。她们二人，天天记日记，天天录音，李宇明把定期寄来的磁带转写下来，及时把磁带寄回去再用。这样，他写出了《1~120天婴儿发音研究》。此文后来刊登在《心理科学》1991年第5期。女儿出生120天后，质量太差的录音机时常罢工。女儿出生10个月后，一家人在武汉团聚。18平方米的空间，到处是纸片，女儿尊口一唱，笔行纸上的伴奏即起。李宇明外出开会等，也带上女儿，随时记录。1987年，他侄女出阁，他的大妹到武汉一边求学一边帮他理家，一边帮他记录。如此，前后6年，他们记录下了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这些语言学家都是科学家。

事业家的眼光就是要不保守，敢创新，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为顺应社会发展，满足和引导社会需求开展研究工作，把我们的语言学当作一项事业来经营。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越来越多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金立鑫教授认为语言学是现代科学中的“瓶颈”科学。当今社会，因为语言学的落后阻碍了相关一系列学科的发展。现代化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各种学科的努力和配合，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自动化控制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等。这些科